

中國社會歷史大辭典



天津古籍出版社

#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第九卷·二〇〇八

Volume IX

天津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9卷 / 常建华主编.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80696-491-0

I. 中… II. 常… III. 史评—中国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39980号

---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9卷)

常建华/主编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tjgj@tjabc.net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26.875 字数640000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80696-491-0

定 价: 75.00元

## 编辑委员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常建华 陈振江 杜家骥 冯尔康 江沛 李喜所  
李治安 刘泽华 南炳文 王利华 王先明 魏宏运  
许檀 余新忠 张分田 张国刚 张思 朱凤瀚

## 编 辑 部

常建华 王昊 王利华 王先明  
许檀 余新忠 张分田 张思

主 编：常建华  
英文译审：张伟伟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协办

# 目 录

##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宗族

- 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 阮云星(1)  
空间与秩序：明清以来鄂东南地区的村落、祠堂与家族社会 ..... 杨国安(34)

## 宋元宗族

- 宋元宗族的坟墓和祠堂 ..... [日]远藤隆俊(63)  
宋元转变的汉人精英家族：儒户身份，家学传统与书院 ..... [美]万安玲(78)  
共财与家法  
——宋代饶阳李氏家族探析 ..... 王善军(89)  
理学社会化与元代徽州宗族观念的兴起 ..... 章 毅(103)

## 宗族与地域社会

- 教育、宗族与地域社会  
——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再考 ..... 罗艳春(124)  
明清时期的北方宗族与地方社会  
——以河南新乡张氏宗族为中心 ..... 申红星(140)  
晚清民国以来的河北宗族述略  
——以河北宗族族谱为中心 ..... 于秀萍(153)

## 家族人口

- 明清以来湖南地区家族人口未婚状况的考察(1413—1949)  
——以湘乡曾氏、胡氏和长沙王氏为中心 ..... 郭玉峰(166)  
科举世家的再生产  
——以明清时期常州科举世家为例 ..... [日]仓桥圭子(183)

## 医疗与社会

- 明代的药材流通与药品价格 ..... [台湾]邱仲麟(195)  
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 ..... 胡 成(214)

## 礼仪习俗

- 论商族骨卜习俗的来源与发展 ..... 朱彦民(233)  
明清时期的礼生与王朝礼仪 ..... 刘永华(245)  
因土成俗:明清江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与葬俗 ..... 张传勇(258)

## 社会群体

- 清朝前中期苏州地区踹匠的存在形态 ..... [韩]洪成和(284)  
近代山东民团研究(1911—1930) ..... 谢贵平(300)

## 国家与社会

- 从州级官员设置的变动看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 夏炎(330)  
清代归绥地区的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 ..... 田宓(343)  
地方精英与慈善事业:近代天津的个案研究 ..... 任云兰(357)

## 研究述评

- 政治思想史家的道与术:宋代理学领域的省思  
——兼论思想传统研究与社会转型之关系 ..... 任锋(373)

## 书 评

- 吉本道雅《中国先秦史の研究》简介 ..... 胡宝华(392)  
历史的反思与反省的历史  
——读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 ..... 孙卫国(396)  
朱开宇著《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  
——宋明间的徽州,1100—1644 ..... [台湾]魏君州(404)  
张艺曦著《社群、家族与王学的乡里实践》  
——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 ..... [台湾]何淑宜(411)  
社会生活:时代变迁中的历史图景  
——《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述评 ..... 李卫东(415)

- 《试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造》译文的订正启事 ..... (418)  
稿件书写格式 ..... (419)  
编后语 ..... (420)

## **CONTENTS**

### **[Lineage in a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 Lineage Ethos in a Local and Patrilineal Perspective: A Historical-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Yixu Lineage in Eastern Fujian, 1100 – 1930 ..... RUAN Yunxing(1)  
Village, Ancestral Temple and Clan Society in Southeast  
Hubei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YANG Guo'an(34)

### **[Lineage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 Clan Grave and Ancestral Temple in the Song and the Yuan Dynasties  
..... [Japan] Endo TAKATOSHI(63)  
Chinese Elite Families in the Song-Yuan Transition: Confucian Household  
Status, Family Scholarly Traditions, and Academies ..... [USA] Linda Walton(78)  
Family Property and Family Discipline: A Case Study of  
the Li Family in Raoyang in the Song Dynasty ..... WANG Shanjun(89)  
Socializ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Lineage in Huizhou in the Yuan Dynasty ..... ZHANG Yi(103)

### **[Lineage and Local Community]**

- Education, Lineage and Local Community: Reexamination of Academy of  
Classic Learning in Wanzai, Jiangxi, in the Middle Qing Dynasty ..... LUO Yanchun(124)  
North Clan and Local Socie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ase of the Zhang Clan in Xinxiang, Henan Province ..... SHEN Hongxing(140)  
About Clan in Hebei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based on Genealogy ..... YU Xiuping(153)

### **[Lineage and Population]**

- Of the Unmarried Population in Lineage in Hunan, 1413 – 1949 ..... GUO Yufeng(166)  
Reproduction of a Gentry Elite Family in Changzhou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Japan] Kurahashi KEIKO(183)

### **[Medicine and Society]**

- The Price and Trade of Medicine in the Ming Dynasty ..... [Taiwan] Chung-lin Chi'u(195)

- Disputes over Sovereignty during the Pneumonic  
Plague in Manchuria (1910.11 – 1911.4) ..... HU Cheng(214)

### [ Proprieties and Customs ]

-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e of Bone Augury of the Shang ..... ZHU Yanmin(233)  
Ritual Masters and Imperial Rit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LIU Yonghua(245)  
Customs Natured in Environment: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Burial  
    Customs in Jiangn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ZHANG Chuanyong(258)

### [ Social Groups ]

- About *Chuai Jiang* (labor working on the last process of cotton cloth)  
    in Suzhou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 [ Korea] HONG Sung-hwa(284)  
On Militia in Shandong: 1911 – 1930 ..... XIE Guiping(300)

### [ State and Society ]

-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in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Light of Changing Assignment of *Zhou* Official Positions ..... XIA Yan(330)  
Local Organizations and Rural Society in Guisui in the Qing Dynasty ..... TIAN Mi(343)  
Local Elite and Charity: A Case Study of Modern Tianjin ..... REN Yunlan(357)

### [ Commentary on Research ]

- Historians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Field of Song Neo-Confucianism:  
    Perspective and Introspection ..... REN Feng(373)

# 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 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阮云星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本文是笔者“宗族风土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世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部分。笔者采用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分析和福建地方社会风土考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和对族谱等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勾勒了宋代末期到民国中期义序宗族的历史。义序个案提示,虽然族产和乡绅的能动性对宗族的组织化具有决定性的功能作用,但父系的观念系谱和以此为基础的宗族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是近世宗族存续的文化前提和社会基础。这种宗族的风土性渊源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结构性要求和以儒教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长期渗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宗族自身亦成为晚期王朝统治和德治政治文化的基础。

**[关键词]**宗族风土;义序宗族;观念系谱;近世;历史人类学

## 前 言

本文尝试论述以下三个问题:1)梳理勾勒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2)简论包括义序宗族在内的近世宗族<sup>①</sup> 的内涵及其在整个中国宗族历史中的位相;3)阐述本文采用的研究视角,亦即作者的历史人类学理解和在本文中的运用。

在这三项内容中,项一是主要内容<sup>②</sup>,在本文的正文中论述。项二也可以说是对项一与笔者提起的“宗族风土论”假说之关系的简要说明,在本文的“结语·讨论”中阐述。在“前言”中,笔者先对项三,即本文的研究视角作一个简单的交待。

国内学界的历史人类学“讨论”数年前有个小高潮,对历史人类学大致有“方法说”和“学

① “近世”指称宋至清的历史时期。吕思勉早年就有“聚居之风,古代北胜于南,近世南胜于北”一说,该处的“近世”即为宋以后的王朝历史时期(转引自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9—10 页)。日本近现代东洋史研究中宋至清的历史时期已通常使用“近世”来指称,它肇始于京都学派的历史分期说,参见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礪波謙编),中央公论新社,1999 年版。本文用“近世宗族”指称宋至清时期的宗族。

② 拙著《中国的宗族与政治文化——现代“義序”鄉村の政治人類学の考察》(創文社,2005 年版)第一章,义序宗族形成史部分的译稿。

科说”两种理解<sup>①</sup>。笔者对此问题缺少专深的研究，总体上的感悟有二：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相互转向或曰方法借用，和以萨林斯提出“文化界定历史”为标志的所谓学科的历史人类学的形成，或许可以看成是世界近现代学术史中，反思“宏大叙事”和学术/科学的人文化取向在历史学人类学这两个学科中之表达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前一阶段方法借用的所谓“方法论”色彩较浓，后一阶段则同时呈现出一定的“学科”性，换言之，后一阶段逐渐呈现出催生新的交叉学科或曰各自学科中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下位学科形成的征兆或局面，这是其一；其二，与此相关，即与上述前后两个阶段的发展及其各自特质相关的，谅是后一阶段更加体现出人类知识学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具体地说，就是后实证主义的确立以至诠释学知识论兴起所产生的影响<sup>②</sup>。就本文而言，如下述主要内容所示，此前笔者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和操作，大致相当于上述方法互借阶段的素朴营为；然而，这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尤其研究在总体上的“宗族风土论”追求，也许正暗合了且直觉质朴地诠释着“文化界定历史”的命题。准确地说，本文是一篇还在进行中的关于义序宗族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前篇；当然，这一学术心路历程“一段风景”的“历史”文本<sup>③</sup>，在多大程度上诠释了“文化界定历史”的命题，还要留待读者们的判定和时间的淘濯。

以下进入这样一个关于义序宗族史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的“历史”文本。

\* \* \*

宋以后，宗族趋于士绅·民间化，然而，宗族固有的血缘性和地缘性仍旧是这种关系和组织的显著特征。注重近世宗族的这种特征，有的中国学者将明清、民国时期的宗族称为“乡族”，有的学者称之为“宗族乡村”；而在 20 世纪中期以后的英语圈人类学文献中，类似的表

① 世纪之交，国内人类学、历史学界有关历史人类学的讨论比较集中，仅以笔者的有限披览择要提示如下：1999 年王铭铭出版了《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用其理解的历史人类学解读泉州的历史。2000 年初版的《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有专章论述历史人类学，该章由主编庄孔韶和另一位作者王甘合撰，两位作者归纳了“意义的历史”、“透过文化镜头的历史阅读法”等历史人类学的诸原则。2001 年历史学博士蓝达居发表“历史人类学简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 23 卷第 1 期）。2003 年初，胡鸿保和陆煜发表“历史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利用和误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 24 卷第 2 期）。此后，随着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期刊《历史人类学刊》的创刊，该“讨论”进入高潮。2003 年 4 月出版的创刊号登载张小军的“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一文引起反响。随后，台湾学者黄应贵于 2004 年 10 月发表“历史与文化：对于‘历史人类学’之我见”（《历史人类学学刊》第 2 卷第 2 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同时，这期间常建华发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的长篇论文（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2002 年卷，武汉出版社，2003 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社会与文化丛书》推出《萨林斯文化与历史论丛》，分别由蓝达居、赵丙祥、张宏明、黄向春、刘永华等译校的《文化与实践理性》（2002[1976]）、《“土著”如何思考》（2003[1995]）、《历史之岛（内收“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桑威奇群岛王国早期历史中的结构”）》（2003[1985]）诸译著先后出版，进而促使了当时历史人类学热潮的形成。这次讨论中所见的历史人类学理解，大致有“方法说”和“学科说”两种，或许可以推举《历史人类学学刊》上先后发表的张小军和黄应贵的论文为各自认识的代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学界同仁们关于历史人类学理解的“讨论”还在继续，而开始于 1980 年代的运用历史人类学（或曰史学人类学化和人类学历史化）的研究实践业已同步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详见常建华 2003）。

② 与此问题相关的笔者的研究，可参阅拙文“民族志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浙江社会科学》，2007 年第 2 期（总第 132 期）。

③ 这里所谓“‘历史’文本”意指时间上“已具有类似学术史的意义”（借用朱凤翰表述。参见，朱凤翰：《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 678 页。附言：该书堪称新近运用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研究先秦历史的杰作），故宜以本来面目呈现之文本之意。

示法有“local lineage”，通常也用“Chinese lineage”，或直接用“lineage”来表示近世宗族<sup>①</sup>。

宗族的士绅·民间化，使得家族·宗族（制度）逐渐成为传统中国王权政治的广泛和重要的社会基础；而在家族·宗族的具体组织形态上，地域性的差异，即大规模的地域宗族组织主要出现在中国东南部这一情形也被人们所认识。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认为，这种地域性的差异可以用中国东南部的“稻作—剩余”和“边境条件”等因素来说明；而近年关于宋以后福建宗族的研究成果则进一步指出了若干具体的地理、历史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因<sup>②</sup>。

## 一、福建·福州地方的宗族风土

### 1. 位置和地理特征

亚欧大陆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的东南部为丘陵地带，此东南丘陵之东部，古为华夏之闽越地，《周礼·夏宫》称之为“七闽”。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此地置福建经略使，取福州、建州两州名的首字，“福建”始称<sup>③</sup>。五代时此地建立闽国，其覆盖面颇大（五代前期公元919年的管辖地域已和明清以降的福建省范围相近）<sup>④</sup>，加之历史上多有置制、地名以闽冠之，故福建亦简称为“闽”<sup>⑤</sup>。

提及福建的地理特征，人们常用“六山三水一分田”来加以概括。除了散落在沿海一带的福州、兴化、泉州和漳州等若干滨海平原外、省内陆地基本上被山地和丘陵覆盖。这种陆地多山多丘陵、水系发达以及濒临东海的地理环境，使得自古以来陆上交通相对不便，而利用江河海洋的舟楫之运则较为发达<sup>⑥</sup>。若从本研究所考察的内容着眼，以下两点尤其须要强调：第一，西北向横卧的诸山脉和西南向流淌的河川，切割出相对独立的自然·人文地域。有关研究表明，至迟到南北朝时代，福建地域在王朝的政治体系中已逐渐形成一个行政单

<sup>①</sup> “乡族”为傅衣凌等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者常用的术语。“宗族乡村”是林耀华提起的概念。可分别参阅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1935]，第1页。英文表示法（lineage）参阅 Maurice Freedman, 1958,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The Athlone Press; 1966,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The Athlone Press; Patricia Buckley Ehrey and James L. Watson eds, 1986,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15. 此外，“localized lineage”，“local lineage”之异同及演变，参阅 Maurice Freedman, 1958,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The Athlone Press, pp. 1—33；西澤治彦、瀬川昌久，“M. フリードマンの宗族モデルの形成とその変遷”，《民族学研究》，56/3(1991.12)，第284—297页。

<sup>②</sup> 弗里德曼的学说参见末道道男、西澤治彦、小熊誠译《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弘文堂，1991年，第15章。近世福建宗族史参阅陈支平《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林汀水“略论福建聚落分布的发展变化”，《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二）》，第5—24页。

<sup>③</sup> 傅祖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福建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页。

<sup>④</sup>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sup>⑤</sup> 今日之福建省，面临中国东南沿海，北邻浙江省、西毗江西省、南接广东省，东隔台湾海峡与台湾岛相望。经纬度为北纬22.33°~28.19°，东经115.50°~120.43°之间。陆地面积12.138平方公里，海域面积为7.2550平方公里。人口约为3282万人（1997年）。省会为福州市。略称“闽”。参阅何少川主编《当代中国的福建（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过康吾《福建省》，弘文堂，1993，第1—8页；傅祖德，前揭书，第6页。

<sup>⑥</sup> 傅祖德，前揭书，第3、6页。

位，“北、西、南各省均沿分水岭划境，因此，形成了行政区划和自然环境相一致的稀有特征”<sup>①</sup>。到了唐宋时代，省内的地方行政区域亦大致与方言地域相互一致<sup>②</sup>。第二，山海间的沿海河口平原的重要性。相关研究表明，沿海河口平原无论是对于考察包括宗族在内的聚落的形成、大聚落以及地方文化的兴衰，还是对于考察历史上由于地方开发及人口增长等原因而引发的省内外的人口流动都很重要<sup>③</sup>。

本文考察的义序宗族所属的福州地方<sup>④</sup>位于福建东部（闽东福州方言地区的东南部），闽江（福建最大的河川）河口地带。自古以来福州地方聚落发达，历史上大都为福建地方的政治中心<sup>⑤</sup>。这种形势的形成和政治地位的确立，除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因素外，以下着重考察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的因素同样十分重要。

## 2. 人文·社会风土

### （1）河口经济的繁荣和政治中心地的发展带来人口的增长

大河流域孕育人类文明可谓世界史的普遍现象。福建早先的开发也始自狩猎生息于建溪、闽江流域的古闽越族人。沿海福州口岸文明的发展还与福州港兼具河、海两港于一身的特点有关，内外水运的发达为福州地域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相关研究表明，宋以后福建商界活跃着两大商帮（以地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商业集团），相对于控制海外贸易的“闽南商帮”，“福州商帮”则具有擅长内地贸易和沿海贸易的传统。“福州商帮”的省内贸易主要沿着闽江在上下游间的口岸进行，沿海贸易则主要沿海岸线，开辟上行浙江、山东的向上航线和下行广东、香港的南下航线。据有关文献记载，从宋到明清时代福州西郊与南郊外的河港及“草市”逐渐发展起来<sup>⑥</sup>。

福州地方的发展繁荣还与此地长期以来作为王朝的地方治所有关。秦代首置闽中郡，治冶县（别称“东冶”）；据《后汉书》记载，汉代“冶县”就已成为“交趾七郡”（包含今之越南的一部分在内的西南地方）朝贡经由的重要治所；此后，尤其是五代王审知治下，南宋、元代以泉州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时期，以及明代“市舶司”从泉州移转到福州的百年间（明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地方官府营为下的福州地方口岸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sup>⑦</sup>。

秦汉以来福州多为福建地方政治中心，这与地处闽江下游的河口地带的地理环境有一

① 讪康吾，前揭书，第2页。另，《当代中国的福建（上）》也有下述记载：陈永定年间（AD557—559），设统括建安、晋安、南安三郡的闽州，福建始为一州。（何少川，前揭书，第7页）此外，何绵山《闽文化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又，参照第2页注3。

② 参见林汀水，前揭论文，第18页。

③ 参照林汀水，前揭论文，第7页；陈支平，前揭书，第4、24页。

④ 本文论述福州时，因考察的地理范围、内容之重点的不同，分别用“福州”、“福州地域”、“福州地方”等概念来表示。“福州”用指“福州城”（包括近郊）；“福州地域”指加上闽县、侯官县的地域；“福州地方”范围相当于福州方言地域全体，指明清时期的福州府。

⑤ 参见林汀水，前揭论文，第7页；何少川，前揭书，第349页。

⑥ 近世“商帮”，参阅何绵山，前揭书，第246页；宋代以降“草市”的论述，参见米倉二郎“福州の発達”，《地球》，第26卷第6号（1936·12），第24页；关于汉代“朝贡”海路据点，参见 Michael A. Szonyi, Village Ritual in Fuzhou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periods, University of Oxford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1995, p.42；明代“市舶司”移福州的论述，参照何少川，《当代中国的福建（上）》前揭书，第9—14页；辻康吾，前揭书，第14页。

⑦ 早期福州都城开发论述，参见米倉二郎，前揭论文，第22—25页；省会特有的行政人口等论述，参见宋汉理（Zurndorfer Harriet）“清代福州的大族：人口、地方行政与社会等级的初步分析”，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北京：中华书局，1992，第437页；北方移民和人口的论述，参见林汀水，前揭论文，第7页。

定关系，也得益于闽江上游的闽北“官道”。公元3世纪，当时的郡守严高着手治所的城郭建设，至公元10世纪刺史钱昱治下城郭初具规模。作为行政中心的都城，通常保有一定数量的官僚、军队及其僚属、家眷等人口；加之历次北方移民迁入和地域开发，时有伴随着外来统治者的君临，大量的军事集团人员以及血缘·地缘性的相关人口进入福州地域的情形。当这种情形与口岸经济繁荣期等促进人口增长的因素相互叠加时，福州地域的人口就会保有一个较大的基数。集中量大的人数是形成大聚落的重要的人口基础<sup>①</sup>。

表一 宋代至民国福建·福州的户数和人口

年	福建地方	福州地方(府)	福州地域
约 980	(465 575)	(94 475)	
约 1080	(1 043 839)	(211 552)	
1182		(321 284)	(82 966)
1278	(700 817)	(199 694)	
1381		(94 514)	(40 738)
1393	(815 527) 3 916 806		
1578	(515 307) 1 738 793		
1580		(98 984) <u>244 040</u>	(44 293) 87 285
1749	7 620 429		
1786	12 809 000		
1829	(3 260 217) 17 339 464	(462 951) 2 706 645	(113 131) 937 350
1851	<u>20 098 556</u>		
1913	(3 088 701)		
1915	14 910 888		(175 044) 875 220
1944	(2 335 066) 11 349 226	(452 036) 2 240 956	(182 430) 816 368

注：本表根据宋怡明(M A. Szonyi)博士论文的表3、表4编制而成。括号内为户数。资料出所：M A. Szonyi, Village Ritual in Fuzhou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periods, University of Oxford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1995, pp. 44 – 45(此未刊资料为福州社会科学院叶翔提供，谨致谢忱！)

表一是16世纪末叶到19世纪中叶福建及福州地方的人口·户数统计。以下两点值得瞩目。其一，清朝中期福建出现了大幅度的人口增长。福州地域的人口增长幅度尤其大，二

① 早期福州都城开发论述，参见米倉二郎，前揭论文，第22—25页；省会特有的行政人口等论述，参见，宋汉理(Zurndorfer Harriet)“清代福州的大族：人口、地方行政与社会等级的初步分析”，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中华书局，1992，第437页；北方移民和人口的论述，参见林汀水，前揭论文，第7页。另，清中期全国性人口激增的论述，参见村田雄二郎“中国近代革命と儒教社会の反転”，溝口雄三ほか《中国という視座》，平凡社，1995年版，第261页。

百五十年间人口增长超过了十倍<sup>①</sup>。有关义序的记载也表明,18世纪初叶(1722年)义序男丁首次超过了千人;这一标志以及此后约一百五十年间的大幅度人口增长,成为义序宗族组织化的基础。其二,同时期福州户数的增长率较低。对于这一时期十倍以上增长的人口增长率来说,福州户数的增长率约为五倍;这表明这一时期福州户均人口数的增大,这一情形或许与16世纪中叶开始加速的“宗族形成运动”的影响有关,也许可以视为17世纪末福建实施的“归宗合户法”的某种结果<sup>②</sup>。

## (2) 北方移民带来的中原世族文化的传播和渗透

一定量的人口可以成为大聚落形成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必要条件。毋宁说一种文化中的“家族法”、一个社会遵循的亲属的组织原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以至决定着聚落形成的样式和规模的取向。

宋以后福州地方的家族以及聚落组织原理的一个重要源头兴许可以追溯到西晋至五代(公元4至10世纪)期间南迁入闽的北方世族文化。典章礼仪等文明发展程度较高、重血缘门第的北方世族及其随同群体的大量南迁,分别在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唐高宗时期(650—683年)和五代时期(907—960年)达到高潮。北方移民带来的中原文明(文化模式、社会组织方式和原理),逐渐成为文明相对滞后、且随着移民的进入生存竞争更加严酷的闽地方先民及社会的憧憬对象,以至成为组织群体、形成聚落的社会组织原理。历史学者陈支平指出:

从西晋到隋朝,是中原士族崇尚门阀的时代,中原士民大量徙居闽中,一方面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技术,有力地促进了闽中的开发,闽中土著的许多习俗如断发纹身等,至南朝时已不复存在。而另一方面,中原士民往往以簪缨世胄自居,歧视和压迫当地土著,血缘家族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

五代乱离和王潮、王审知率兵据闽,形成中原士民移居闽中的第三次高潮。……随王氏兄弟入闽的固始同乡,无不成为了闽中的统治者,门阀宗族的夸耀尤成必要。……这种家族血缘和统治者的优越感,更促使闽中居民对于宗族的依赖和标榜。因此,从隋唐以至五代,是中原地区门阀士族制度逐渐衰落消亡的年代,而在福建则完全相反,门阀宗族的标榜,为取得政治和社会、经济利益,正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sup>③</sup>

以上的摘要也是笔者提起的福州地方的家族以及聚落组织原理之北方世族文化(是一重要)源头说的一个重要依据。换言之,随北方南迁移民带入福州福建的中原世族文化,此后在闽地作为优越的文化基本上没有中断地延续了下来;同时,中原世族文化由于在闽地的开发竞争和聚落、社会的统合过程中还具有现实的重要功能,便逐渐在地域社会中得到传播和接受;进而又渐渐成为宋以后开始转型,并在明清时代臻于成熟的士绅·民间宗族的一个

① 参照朱维干《福建史稿(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79页。

② 义序人口统计,参照黄秀卿“传统社区及其变迁概述”,(2001,未刊稿);17世纪末福建“归宗合户法”的论述,参见郑振满,前揭书,第190页;16世纪中期以后加速的“宗族形成运动”的论述,参见井上徹《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研文出版,2000年版,第5.200—248、320—428页。

③ 引自陈支平,前揭书,第3—4、5—7页。

文化的资源。

### (3) 理学传播·科举制度化和乡绅地方自治的促进作用

首先,检讨理学传播对于普及宗族理念的作用。

从儒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儒学的新变动自唐代中期以后逐渐展开。朱子学可谓集“唐宋变革”成果之大成,包括了存在论、宇宙论、教育论、道德论和《家礼》(鬼神论)等内容。此处,主要围绕《家礼》的礼教性·宗教性及其社会作用略作概观。

《家礼》共分通礼、冠礼、婚礼、丧礼和祭礼五卷,是一部主要以宋代的士大夫阶层为对象,规定·说明儒家仪礼的论著。《家礼》约束士大夫谨守礼法,并以此来制御教化众人,维持和强化礼教精髓之所在的家族伦理和家族制度。近期的一些研究还指出,《家礼》给予后人的不仅仅只是礼教性方面的重大影响,其在宗教性方面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些研究认为,朱子(1130—1200年)没有忽视以祖先崇拜(这是庶民·民间信仰的关心所在)为核心的儒教的宗教性。他依据“气”来解释鬼神的鬼神论并非完美,但其对祠堂制度和祖先祭祀仪式的设计诠释方案颇为具体颇有创意。由于这些方案中依照和体现的宗教性在庶民阶层中根深蒂固,所以《家礼》教化在随后的士绅·民间宗族的普及和宗族文化的社会统合方面能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sup>①</sup>。闽学(福建儒学)是理学的重要流派,承传朱子思想、仰仗朱子的影响力,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渐超越地域,成为王朝的意识形态。

福建·福州素有儒学传统,早在北宋的仁宗时期(1023—1060)就有不少儒学学者(当时包括著名的“闽中四先生”在内的儒学名家之中,福州地方和闽北出身的学者为数甚多)热心研究、传播儒学。此后,尤其经过朱子和其弟子的长期教化实践,如通过办书院研究传播理学等的努力,到了明清时代以福州地域和闽北为研究中心的闽学得到了大发展,以至福建被誉为“理学之乡”。在此风气下,与福州·福建科举功名者辈出的成就相得益彰,包含家族·宗族伦理的理学逐渐渗透到了社会的底层<sup>②</sup>。

其次,对科举制度与宗族的关系作一概观。

在近世宗族制度和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不断完备的科举制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科举始于隋代,是为了改变贵族世袭的门阀政治而采取的新型选官制度。经过唐代历时三百多年的实践,到了宋代初期又采取和确立了“殿试”和三年试制,至此作为皇帝集权的文治政治之一环的功能已基本齐备。科举制度无疑主要是回应强化王权主义和唐宋以来兴起的新富民阶层的政治社会需求的产物,然而制度的长期的实施使得全社会渐渐形成了一种“进士党”正统和重视科举,以至通过组织化的行动来确保科举功名者的社会风气<sup>③</sup>。

在福建地方,这种崇尚科举的意识和行动与前述的外来中原世族文化的转换和活用相互作用,成为宗族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而地方宗族愈发达,则愈能有效地应对科举,支持保障本族学子在科举中获取功名。近世历代科举的福建进士人数均居统计数前位的事

<sup>①</sup> 儒教宗教性的研究,参见加地伸行《儒教とは何か》,中央公论社,1990年版,第185—210、204—210页。2007年新注:章毅通过个案探讨了理学鬼神观及其地方传播的机制和它的义理结构对宗族观念构成的内在支撑,参见氏著《理学社会化与元代徽州宗族观念的兴起》、《中国社会历史评论》本卷。

<sup>②</sup> 参见何绵山,前揭书,第15—31页;间野潜龍《朱子と王陽明:新儒学と大学の理念》,清水书院,1984年版,第12—13、92—132页。

<sup>③</sup> 参照宫崎市定《科举》中央公论社,1963年版,第156—188页。

实,即是这种相互关系的一个例证。“宋代共有 7607 人中进士,22 人为状元,按人口比例,为全国第一……元代福建有 67 人中进士,高于汉中南方各省。明代福建有 2410 人中进士,在全国仍名列前茅;……清代福建有 1337 人中进士,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sup>①</sup>。历史上福州更获有“无闽不开榜”的美誉。如,宋代福州进士人数多达 2347 人,几乎占了福建同期进士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再从历史上的状元人数看,福建状元总数中福州状元所占的比例一直很高。有关统计表明,宋代福州状元 9 人(福建共 22 人)、明代福州状元 6 人(福建共 11 人)、清代福州状元 2 人(福建共 3 人),可见宋以后福建状元总数中福州状元所占的比例大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sup>②</sup>。

关于明清时期福州地域的世家大族与科举的具体关联方面,有几篇依据地方志(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 1613 年《福州府志》,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 1906 年《侯官县乡土志》、《闽县乡土志》等)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表明,以宗族的进士人数的多寡为序,可以得到以下比照,“闽县林氏四一人、陈氏四十人、郑氏二十人、黄氏十人、王氏九人、张氏八人、高氏七人、邓氏七人……侯官县林氏一三人、王氏一二人、陈氏六人……”<sup>③</sup>。而以上进士人数较多的宗族,大多是直至清光绪年间本地域的“大姓”(人口众多,一区内超过六百户者)宗族和“世族”(唐代之前南迁的北方世族后裔)宗族。前者如林、黄、陈、郑、张、何、程、洪各氏的宗族,后者如林、黄、陈、郑诸氏的宗族。可见福州地域的世家大族与科举功名有正相关性,以上的世家大族均为进士辈出(在闽县和侯官县均为进士数前七位以内)的地域宗族<sup>④</sup>。

关于宗族与科举的相关性,韦伯作过颇有见地的分析,他指出:

在家产制国家……作为官吏……占有着资产蓄积的最好的位置。退职官僚们不同程度地将这些合法获取资产投资于土地。其子孙以共同继承人的身份留在家族共同体中,他们准备好使有望的本族学子能专注科考所需的资金,为了有朝一日家族中再有若干成员能获取日后的良机。这种良机即是家族成员能获取收入颇丰的官位,以再度荫及宗族的机会。<sup>⑤</sup>

近年日本中国史学界宗族研究的成果也为以上见解提供了新的例证。例如,井上彻从礼制和宗法实践的视角对近世宗族进行了再考察。井上彻指出:

(研究表明,)宋代宗族是回应科举官僚制度的产物……在科举官僚制和诸子均分的家产继承制度之下,同居共财的家庭单位难以实现官僚身份的世袭和官宦家系的延续,数代后其子孙得面对家道中落的事态。作为克服这一宿命的一种手段,士大夫注目宗法,即周代封建诸侯实行的亲族统制原理。希冀如能形成宗子统领的集团,这样在为

① 参见何绵山,前揭书,第 216—217 页。

② 宋代福州进士数的统计,参见何少川《当代中国的福建(下)》,第 350 页。福州出身的状元的统计,参见黄启权主编《福州乡土文化汇编》,福州晚报社,1990 年版,第 380 页。

③ 参见栗林宣夫“清代福州地方における集落と氏族”,《立正史学》,第 39 号(1975),第 32 页。

④ 参见宋汉理(Harriet),前揭论文,第 442、445 页。

⑤ 笔者转译自间野潜龍,前揭书,第 60 页。

数甚多的族人当中，科举功名者的比率有望得以提高，可以在事实上实现世宦（世袭官僚）的家系。……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官僚辈出之母体的性格是宋代宗族的首要的题中之义。<sup>①</sup>

再次，就乡绅政治与地域宗族的关系作一考察。

明清时代确立的乡绅政治也对同时期的宗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上述的近世科举制度为当时新兴的士大夫的产生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明代以降这些士大夫在祖籍地被称为“乡绅”。有关研究表明，明末清初作为帝国支配制度的“乡绅政治”业已确立；不少研究成果证实，特别是清代的地方政治和乡村社会，事实上实行的是乡绅支配<sup>②</sup>。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看乡绅政治的确立具有以下的政治和社会的效用和意义。其一，帝国认可乡绅的有限权威和权力（非宗法政治的·非贵族式的政治地位）——通过亦为德治政治文化之现实操作装置的科举制度授予士人身份、默认“宗族法”和有限的基层自治——，授予一定的经济社会特权（免税免役、礼仪道德上的地位等——也可看成帝国运营的一种成本和技巧——），委以家族·宗族及其地域社会的有限的支配权（如奖励宗族，推行乡约等）<sup>③</sup>。其二，民众（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虽觊觎乡绅的特权，但一般认同乡绅代表的文化、认可他们实行的政治·社会的支配——如地域宗族的乡民，一方面保有其私有经济等平民的生活和空间，一方面享有宗族共同体的诸恩惠（族田的利益、祭祀的连带等）、归依乡绅族老的庇护与支配——<sup>④</sup>。换言之，乡绅政治的确立意味着乡绅成为当时帝国统治和社会秩序之间不可或缺的结构性的存在。

这种所谓“中介者”的作用，与乡绅的社会·文化的性格有着本质上的联系。而乡绅的社会·文化的性格则可以从乡绅政治的内容中来辨认。乡绅政治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身兼帝国基层支配和地域社会的双重代理人身份，联络沟通官民（如，税收·保甲等的合作、交涉）；第二，保护地方利益、推进地域社会福利（如，倡导治水、铺路搭桥、维持治安等）；第三，履行教化职责，振兴地域文化（弘扬儒学、振兴学务、善举调停、编修族谱与地方志等）<sup>⑤</sup>。可见从乡绅政治内容中浮现出来的主要是一种依据“德治”（依凭道德楷模和教化垂范的礼治实践）传统来制御地域民众的社会·文化性格。

① 笔者缩译自井上徹，前揭书，第429—430页。

② 文献中“乡绅”的最早记录是1588年的《明实录》，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清代乡绅统治的历史背景的论述，参见伊原弘介“清朝國家の農村統治と紳士身份”，今堀誠二編《中国へのアプローチ：その歴史的展開》，勁草書房，1983年版，第184—187页。

明清时期士绅政治的论述，参照下列论著：根岸吉《中国社会における指導層——耆老紳士の研究》，平和書房，1947年版；吴晗、费孝通等著《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先明《近代绅士》，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の研究》，汲古书院，1978年版；Hsiao-tung Fei, China's Gent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李守经、邱馨主编《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体系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79—81页；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9页。

③ 参见刘广明，前揭书，第76—87页；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2、51页。

④ 参见宋汉理(Harriet)，前揭论文，第440页；根岸吉，前揭书，第21页；刘广明，前揭书，第84页；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9—80、130—163页。

⑤ 参见张仲礼，前揭书，第48—68页；根岸吉，前揭书，第25—31、175—246页。